

第一章 青春^①

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篇著名文献，民国时期曾经广泛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大学语文读本也将之作为大学生阅读的范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引用此文。^②

一、《青春》的写作时间

《青春》最初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2卷1号上，学术界以往在编辑李大钊选集、文集、年表、年谱时，也多将此文系

① 本章初稿曾提交2019年6月22—23日“百年回看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文论坛”，并在会上宣读交流。

② 例如，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北大师生态谈时发表讲话，指出：“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态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北大师生态应该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说过，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族，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27页）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并在与北大师生态谈时发表讲话，其中提到：“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2013年的5月4日，他在到中国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所发表的讲话中也说过：“广大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树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

于其发表时间，即1916年9月1日。但是，李大钊于1916年5月上、中旬从日本归国后，即忙于参加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斗争和宪法研究会的活动及负责主编《晨钟报》等，很难有时间去构思和写作如此大块的理论文章。正因为如此，长期从事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朱成甲认为，《青春》一文“是在日本写的”，写作时间在其5月上、中旬回国之前。^①

这一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但还可以更加精确些。实际上，《青春》一文开门见山即点出了此文写作的时间和地理位置：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②

这短短几句话，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时空信息。

第一是时间。“春日载阳”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径，爰求柔桑。”汉代毛亨《笺》云：“载之言则也。阳，温也，温而仓庚又鸣，可蚕之候也。柔桑，稚桑也。蚕始生，宜稚桑。”^③南北朝萧统《文选》“春日载阳，合射辟雍”引各家注：“综曰：阳，暖也，言春三月之时，与诸侯合射辟雍，行礼教。……《东观汉记》：永平三年三月，上初临辟雍行大射礼。铄曰：载阳，三月也，将行射礼。”^④元代吴澄《月令纂言》“仲春之月”说得更清楚：仲春之月指“惊蛰后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惊蛰之日，桃始华，后五日仓庚鸣，后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元鸟至，后五日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对这一节气中的“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吴澄引历代注家：“郑氏曰：皆记时候也。仓庚，黄鹂也。孔氏曰：汉初以雨水为二月节，后改惊蛰为二月节。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风冻之则凝而

① 朱成甲著：《李大钊传》（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③ [汉]毛亨：《毛诗注疏》卷第八，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④ [南北朝]萧统：《六臣注文选》卷第三，《四部丛刊》影宋本。

为雪，东风解之则散而为水。孟春，东风既解矣，仲春于是始雨水。……澄按：《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二月，婚姻之时也。又云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二月蚕将生之时也。”^①

这一段中的“当兹春雨梨花之时”，也同样提供了很重要的时间信息。

清人林寿图《马嵬坡怀古》诗：“年年寒食墓门关，时有游人吊玉颜。春雨梨花能解语，不烦海上访仙山。”^② 陆时化《奉题紫薇精舍》诗中有“春雨梨花寒食节，几番和泪奠清尊”^③之句。两诗中都提到了“寒食节”，亦即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前的一两日，为纪念春秋时被烧死的晋国大夫介之推而设的节日，禁生火煮食，只吃冷食。

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这些相关记载看，李大钊通过“春日载阳，东风解冻”及“当兹春雨梨花”14个字，明确向我们指出了他写作此文的时间是在中国农历二月惊蛰之后，寒食节或清明节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李大钊从当年惊蛰（二月初三）开始写作此文，到寒食节（三月初二）时完稿，亦即从1916年3月6日前后开始构思撰写，到4月4日左右完成。完稿之时，“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这是早春特有的景色，垂柳新芽半露，尚未完全展开，近看呈嫩黄色，远看则是青黑色，天气清冷，“二月连阴柳带青，萧斋却扫正清冷”^④，如果再迟一些时日，随着天气变暖，景色便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微雨新晴三月天，白堤垂柳欲飞绵。”^⑤ 黄色已经变深变绿，空中白色的花絮开始漫天飞舞。

第二是地理方位。“远从瀛岛，反顾祖邦”，“瀛”，指大海，古代与“洲”连用，指传说中的海中“仙山”、海岛，近代文献中则常用来借指日本，如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⑥ 李大钊早期文章中，有时用“东瀛”称日本，有时用“瀛岛”指日本。这说明，李大钊写作《青春》时的地点是在日本。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远从瀛

① [元] 吴澄：《月令纂言》。

② [清] 林寿图：《黄鹄山人诗初钞》卷十四，清光绪六年刻本。

③ [清] 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清乾隆怀烟阁刻本。

④ [清] 朱锡绶：《春阴》，《晚晴簃诗汇》，卷一四六，第377页。

⑤ [清] 朱锡绶：《春阴》，《晚晴簃诗汇》，卷一四六，第377页。

⑥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6页。

岛，反顾祖邦”之说，即是在远离家乡的岛国日本，遥望祖国。

二、撰写动因

1916年的春季，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达到高峰，进步势力方面的反袁斗争也正如火如荼。李大钊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和神州学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积极投入反袁斗争之中，并于1916年1月回国两周，返日后不久，因国内斗争需要而毅然弃学归国。在斗争如此激烈、事务如此繁多、时间极其紧张的环境下，李大钊撰著《青春》这样理论性、思想性极强的长篇文章，显然并非出于学业上的要求，更非是要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另有动因。

（一）目睹“个人”“自杀”问题，要为中国“个人”，尤其是“青年”，寻找生路

研读李大钊早期文章，“悲观”“厌世”“自杀”“他杀”等词都是高频词，也是其早期关注和探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而社会上一些“文豪”大力歌颂“死亡”给青年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使得李大钊忧心忡忡。

例如，在《原杀》（1913年9月）一文中，李大钊写道：

“天祸中国，杀机四伏，怨气郁蒸，愁云漫空。或争权固势，煽动兵机；或邀宠希恩，杀人献媚；或擅含沙之技，弹肉横飞；或极愤世之心，饮刃自裁。同兹世也，人何以慈祥乐利，吾何以残暴愀哀。同兹时也，人何以熙皞雍和，吾何以恣睢怨戾。光风霁月之天，乃一变而为血浪磷光之域。耗矣哀哉！吾少典氏之子孙，不死于暴君，不死于强敌，不死于水火，不死于疫疠，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也矣！呜呼！岂不痛哉！”^①

又说：

“满清末造，吾人犹有光复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虽压迫

① 李大钊：《原杀》，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79页。

横来，而吾人以有前途一线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呜呼！社会郁塞，人心愤慨，至于此极，犹不谋所以救济之。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佛说天堂而天堂无路，耶说天国而天国无门，万象森罗中，但有解脱之一路，即自杀是也。哀哀禹域，神明胄裔，行见其相杀、自杀以终也。然则求之荒渺，探之幽玄，毋宁各自忏悔，涤濯罪恶，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为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来纪，庶尚有生人之趣乎？”^①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那些称得起“文豪”的大知识分子、文学家，李大钊认为，这些人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应一味歌颂“死亡”，不应误导青年人走向悲观绝望和“自杀”之途。他指出：

“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使更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其心脾，断其希望，则求一瞑而自绝者，将接踵以闻也。暴俄肆虐，民遭荼毒，一时文豪哲士，痛人生之困苦颠连，字里行间，每含厌世之彩色，凶生赞死，厌倦人间，如苏罗古夫、阿尔慈巴塞夫、载切夫等，各以诡幻慑人灵魂之笔墨论‘死’，致一般青年厌世、自裁者日益加多。”^②

这里，李大钊所提到的苏罗古夫、阿尔慈巴塞夫、载切夫，都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苏罗古夫，又译梭罗古勃（1863—1927），著有《老屋》《小鬼》《饥饿的光芒》等。其作品多写颓废变态心理，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其《饥饿的光芒》后来曾被国民党中央列入查禁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82~83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21页。

书目。阿尔慈巴塞夫，又译阿尔志巴绥夫（1878—1927），著有《沙宁》《工人绥惠略夫》等，其作品多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载切夫，又译扎依采夫（1881—1972），俄国印象派作家，著有《阿格拉芬娜》《天蓝色的屋》等，其作品擅长描写心理，充满神秘色彩。

李大钊指出：

“虽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社会黑暗固无与于作者，而社会之乐有文豪，固将期以救世也。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社会蒙自杀流行之影响，责又岂容辞乎？”

“嗟呼！嗟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茫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之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①

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11月10日）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②李大钊反复阅读陈独秀的文章后，深感不安，遂致信《甲寅》杂志：

“最初反问，我需国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则国家者，方为可爱。设与背驰，爱将何起？必欲爱之，非愚则妄。循是以进，自觉之境，诚为在途。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将由兹自堕于万劫不复之渊，而以亡国灭种之分为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国灭种之自觉心为也。”^③

李大钊指出：

① 李大钊：《文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21页。

②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3、88页。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侔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勉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①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甚巨，国人愤激，“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李大钊对此颇为感慨。他写道：

“爱国之诚，至于不顾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悯，而亦大足戒也。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聪颖优秀者，悉数且甚寥寥，国或不亡，命脉所系，即在于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躯干，纷纷以向自杀之途，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国真万万无救矣。然则国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国之罪，无与于人，我自尸之。少年锐志，而亦若此，是亡国之少年，非兴国之少年也。夫自杀之举，非出于精神丧失之徒，即出于薄志弱行之辈。……且时日害丧，国耻难忘，充吾人之薪胆精神，迟早当求一雪，即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不此之图，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妇之自经沟渎，是人而不战而已屈我于无形，曹社之鬼，嘻嘻笑于其侧矣。是皆于自觉之义有未明也。”^②

（二）痛感“圣人”“伟人”精神上政治上“权威”太重，压抑国民创造精神，欲为“平民”求精神解放

李大钊指出：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50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53~254页。

“尝远稽列国，近证宗邦，知民彝之絃蔽，自由之屈束，每于历史传说、往哲前贤、积久累厚之群为尤甚焉。为其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斯其民彝受翳蒙也弥厚，斯其政治趋腐败也弥深。故释迦之不生于他国，而生于印度，他国之歆羨之者，或引为遗憾千万；而自印度言之，印度之有释迦，印度之幸，亦印度之不幸也。耶稣之不生于他国，而生于犹太，他国之歆羨之者，或引为遗憾万千；而自犹太言之，犹太之幸，亦犹太之不幸也。孔子之不生于他国，而生于吾华，他国之歆羨之者，或亦引为遗憾万千；而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①

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如此矛盾心态？李大钊分析其中的原委，指出：

“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自有耶稣，而犹太之民族不啻为耶稣而生，耶稣非为犹太民族而生焉。自有释迦，而印度之民族不啻为释迦而生，释迦非为印度民族而生焉。是故释迦生而印度亡，耶稣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吾华衰。迄今起视此等文化古邦，其民之具秀逸之才、操魁奇之资者，日惟鞠躬尽礼、局促趋承于败宇荒墟、残骸枯骨之前，而黯然无复生气，膜拜释、耶、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吁！此岂是等圣哲之咎哉！”^②

在世变剧烈之时，豪强辈出，他们：

“乘时崛起，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锢蔽其聪明，夭瘵其思想，销沉其意志，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③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73~274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74页。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75页。

李大钊认为，尊重历史、崇奉圣人固然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但是，过分尊重、崇奉，则会走向反面：

“夫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之心既笃，依赖之性遂成于不识不知之间。然而史乘之往辙，不可以回旋也，圣哲之伟迹，不可以再现也。而兹世所遭之艰巨，所遇之屯蹇，虑非一己微末之才所能胜。于是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而‘神武’之势成，而生民之祸烈矣。例证不远，即在袁氏。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之华、拿，忽变而为人人切齿之操、莽……”^①

（三）痛感重压在中华民族心头上的“亡国”“灭种”心理，希望为中华民族重建心理自信

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列强不仅从军事上、经济上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而且还打着“文明”“进步”“科学”等旗号，从思想文化上打击中国，试图摧毁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正是在此种时代背景下，“睡狮”说、“黄祸”说、“东亚病夫”说、“老大帝国”说等陆续传入。更有甚者，有的西方学者还荒唐地断言：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种”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来的，也无所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也都是“西来的”^②。随着这些邪说的广泛传播，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显然，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救亡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78页。

②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拉克伯里（F. De Lacouperie, 1844—1894），著有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ditions of Babylonia in Early Chinese Documents*, London, Distributed by Osnabrück Zeller, 1894, 1966 等。有关研究，参见李帆：《拉克伯里学说进入中国的若干问题》，收入李帆著：《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3~102页。

对于西方人的这种种说法，李大钊是清楚的。他在文章中指出：

“外人之诋中国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①

“异族之觊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②

李大钊指出，外人如此诬蔑中国，如此侵略欺压中国，但只要中国人不甘于亡国，就一定有民族复兴的希望，否则只有坐亡而已。他指出：

“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今日本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狡焉思启，作瓜分之戎首，逞并吞之野心……凡十九条〔二十一条〕……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国人而不甘于亡，虽至今日，犹可不亡；国人而甘于亡，则实中国有以自亡耳，何与日本！”^③

李大钊认为：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顾亭林氏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谓亭林亡国之说，仅指一姓之丧亡，则其亡天下之说，即今日亡国之说也。谓其亡国之说，乃混易姓亡国于一事，则其亡天下之说，即今日亡群之说也。今日之群象，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于禽兽，其真所谓仁义充塞人将相食之时也，其真亡群之日也。群之人而甘于亡也，夫又何说？其不然也，则保群之事，必有任其责者矣。”^④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328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312页。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11、215、216、218页。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56页。